

从西洋文化回归儒学文化

——林文庆大学教育思想解析

张 亚 群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林文庆作为南洋著名华侨学者、社会活动家,在多重文化认同的影响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大学教育思想。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近代西方大学理念,构建了自己的大学教育模式。在私立厦门大学 16 年的校长任内,他坚持科学与国学并重的办学理念,竭力推动科学教育和重点学科建设,奠定了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方向;坚信教育救国,崇尚儒家价值观,倡导通识教育,促进了专门人才的培养。作为学贯中西的校长和教育家,林文庆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为当今大学教育发展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林文庆; 大学教育思想; 历史地位; 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0)01-0087-07

Return to Confucian culture from the western culture

——On Lin Wenqing's thought of college education

ZHANG Ya-qun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the famous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 and social activist in Southeast Asia, Lin Wenqing, who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y, formed his unique thought of college education. Based on Confucianism, he absorbed the idea of the modern western university and constructed his own mode of college education. As a president of private Xiamen University for 16 years, he persisted in schooling idea which lays equal stress on science and Chinese classics, endeavoring to promote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key disciplines,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scipline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He was firmly convinced to save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upholding 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advocating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 talents. As a president with knowledge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and an educationist, hi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schooling practice left many valuable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ducation nowadays.

Key words: Lin Wenqing; the though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historical status; inspiration

收稿日期:2009-11-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7JJD880236)

作者简介:张亚群(1961-),男,安徽庐江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大学文化研究。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林文庆(1869-1957)作为一位学贯中西、影响颇广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享誉东南亚。陈嘉庚曾称赞:“南洋数百万华侨中,而能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精神者,当首推林文庆博士。”^[1]从倡导新马华人教育与社会改革,复兴和传播儒学文化,到执长厦门大学,培育专门人才,推动科学教育与国学研究,林文庆对华人教育现代化和儒学文化传承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林文庆诞辰140周年之际,深入探析其大学教育思想的成因、内涵与特色,客观评价其历史地位,对当今大学教育改革不无启迪与借鉴意义。

一、海峡侨生的多重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与教育思想密切相连,考察林文庆的文化认同演化轨迹,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其大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原因。林文庆作为英国统治下海峡殖民地出生的第三代华侨,其文化认同是复杂的,主要包括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马来文化三个方面。^[2]这种文化认同又是变化的,随着教育经历、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其重心逐渐回归到以华语汉字为媒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之中。

林文庆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途径,受到上述三种文化的不同影响。他幼年曾短期入福建会馆附设书院,学过《四书》《五经》,并在祖父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由此植下了华族文化的意识;而其峇峇的身份则在语言和生活习俗中留下了明显的马来文化印痕。在其后成长过程中,林文庆主要是受英国殖民地教育。小学入读官立英文学校,中学考入莱佛士学院。毕业后考获英女王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获得医科学士和外科硕士。

以英语为媒介的完整的西式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使林文庆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基督教文化熏陶,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崇尚科学教育。由此,他不仅掌握了系统的医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日后职业生涯奠定了专业基础,还极大地拓展了文化视野和知识面,了解了欧美日高等教育的历史变迁及现状特点,加深了对西方社会文化的认识。这些成为其大学教育理念的一个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华人社会的危机,激发了林文庆强烈的寻根意识与文化忧患意识。族群认同的激励和游离于三种文化的困惑,使林文庆在留学英国时决心学习中文,认同中华文化。通过自学及人际环境的影响,林文庆不仅学会了华语,精

通中文,而且成为一名坚定的儒学信仰者,以复兴儒学为己任。19世纪末20世纪初,林文庆在新马华人社会发起了一场儒学运动。他借助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改造儒学文化中不合乎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内容,更新华人的教育观念,造就一代新人。这场儒学复兴运动,旨在寻民族文化之根,而非复古;是以新的学理重新阐释古老的儒家观念,从儒学基本理念出发,阐释现代大学的宗旨、功能及其文化意蕴。认同和回归儒学文化,成为林文庆大学教育理念的又一重要来源。

学习华语华文和儒学传统是维系中华文化认同的首要途径。林文庆曾论及推广华语华文和儒学的动机:“盖自游学西国初归之时,见华侨之在南洋景况,而惧其子孙之不识本国语言文字,自失其无数子孙矣。故虽自知无学不才,辄以孔子之道告人,勉人以学普通语,于学堂传孔子之道德学。”^[3]为此,林文庆在海峡华人社会推行母语运动持续10多年。他为新华女校设立华文科目,在不同场所开办华语传习班,选择《左传》篇章作为学习华文的教材,在立法会议上请求政府为华人开设华文班,呼吁华人社团侨领在庙宇内的学堂增设华文课程,远赴爪哇游说华人采用华语为共同语。^[4]这些举措倾注了林文庆认同中华文化的殷切之情,收效显著:“凡南洋各地,有华人之居,则有孔子学堂,可喜也。”^[5]

辛亥革命后,林文庆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将汉字教育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呼吁国人重视学习汉语言文字:“如失汉文之学,而盛谈外国语言文字新名词,此无异自灭。不久则汉文将与拉丁字胥归于尽,而国不待瓜分而自瓦解,永无再合之望矣。”认为:“今日而民国之亿兆众,果能保守儒教,以大普及汉文,则外患特小小焉耳,吾不虑乎其分也。”^[6]

在儒学研究和儒学教育方面,林文庆不遗余力。据统计,林文庆在1921年出任厦大校长之前,至少有15篇以“儒学”或“儒教”为题目的文章,其中《论儒教》用中文写成,属于长篇之作;专书两本,包括:英文著作《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London, 1901)(《从儒家观点看世界大战》)及中文著作《孔教大纲》,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论著,或多或少论及儒家思想。^[7]林文庆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建立于孝悌上之伦理;合乎理性的宗教;哲人或圣君统治下的民主政治;性善论与教育。^[8]

林文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海峡殖民地领导了华人教育与社会改革运动,影响广泛,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林文庆以儒学作为反侵略的思想武器,呼吁海峡华人、中国

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维护正义与和平。他加入英国籍,组织华人支持英国对德作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19年,英国政府授予他大不列颠帝国勋章,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二、《孔教大纲》的大学教育理念

《孔教大纲》全称《民国必要孔教大纲》,完稿于1912年10月,1914年3月出版,是林文庆以中文阐释儒学的第一部专门著作。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兼孙中山机要秘书、民国政府卫生部总监督(部长)的林文庆,十分关注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问题。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凝聚国人教育宗旨,学习外国现代文明而不失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如其自序所言:“惟久于深接外国,且数年留学欧洲,深为西国之教所激动。知欧美日本之强,实有其人之存道德,故其格致学之进步外,则其人人之各有为人资格也。”林文庆擅长英文却不用英文,而是以半途学会的中文撰写《孔教大纲》,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读书人阅读、理解、传播其儒学教育理想,推动中国教育与文化的革新。

这本著作自《儒道序略》始,至《中华民国必不能离乎儒》终,共有35篇,从不同层面论述了儒家思想的精义及儒学教育的现实意义。时人称林文庆:“学擅中西,深于析理。以举世轻薄至道之秋,独能昌明绝学;以我国群趋外教之顷,独能不负儒宗。”其书“具儒理之概,阐道义之真,守古而不泥乎古,言新而不诡乎新。必准今酌古,而折衷于吾道。可以医俗,可以砭愚,而极之致治以安天下,皆实理也”^[9]。就其大学教育理念而言,主要见之于《教学大宗旨》篇,《儒学考》、《政体》、《礼》等篇也偶有论及。其中的大学教育思想涵盖以下四方面:

1. 大学的性质与立学宗旨

林文庆认为:“行儒道之教,学为大根本”;学校教育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层次。他比较不同层次教育的性质与培养目标之差异,指出:“盖君子立学之大宗旨也,首在教人以为人。其道在孝悌,以行仁于国。此小学之事”;“盖中学者,为开其智力,以入实学之门者也。其宗旨在能自寻学识,不待乎师,而亦足以教人”^[10]。

大学则是继普通教育之后的“成人者之所学”及专门之学,其宗旨是培养具有高尚品格的专门人才。“大学者,不仅为成人者之所学,理之既深,自非成人不可几之。要在使有德行才能者,而研求深理;以格致之学,使国民进步;不但益于己国,且益及举世。”

“必取已成之专门学,以推求新理。而大学毕业,不止谓已学专门,须自研求一门之学,自寻新理而后。可。至如为人之道,须有普通资格,博学而知其约,方为大学真意。我国办学,以此为合。”^[11]

2. 大学教育的内容与功能

从大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出发,林文庆推论大学教育内容,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的专门知识,而且应纳入儒学经典著作。他认为:“今日之于经书,为欲求其要理耳。此前代之用也,故必新经以合今世之用。是则儒者,不计其何等新书,要在合理否耳;是则用新书,不必排儒,要有正儒,方能著新书耳。故学堂之事,不得舍乎儒者。”^[12]林文庆还运用日常的生物学知识,阐明科学研究必须原始察终的道理,突出了儒家经学的现实价值。在《儒学考》篇,他强调儒学的实践性特征,抨击腐儒、伪儒的危害性,要求行儒学之实。

在《政体》篇,林文庆提出民国教育的功能:“在教民何以治生,次则卫生保健之法,道德之要。预备专门之学,使才智之士就业,如美术学、古学、诗史学、各等实学,皆必有专门”;“自小学以至大学,自浅而深,教以为民资格”。^[13]他对比中西教育的差异,认为:“夫西人之文明,不在衣服,不在饮食,实在乎人人之受有教化,有礼义也。”西人之强之富之美盛,“非兵器之利,非军队之勇,非实业商务之兴,非格致学问之盛,盖根本于道德教育也。以一人而充之人人,一国上下,有礼有乐,万众一心,故有国体,且有国志耳”。^[14]由此证明,伦理道德教育是大学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

3. 大学的师资建设与办学体制

林文庆主张借鉴德、法、英、美等国大学的不同经验,综学其所长。德国“大学甚备,而甚锐进,所重为格致之学”。“法国之办学亦甚善”,极重师范学堂。“英美办学之法,多而杂。有私立,有教会所立,有政府所立。以儒道而言,我国应先立师范学堂,而求诸英美,聘得良师,而主讲席,此一策也”。“师范学堂,须集最高学问之人,以详究国粹,而备简明之书。凡各专门之学,须备有为师者考究之书。”^[15]

在办学体制方面,林文庆鼓励官、私并举。他认为:“最善者,学堂随各地自为,而合考之,以定优劣。惟考法宗旨,必先行布告,则公私有竞胜之心,进步自速。但私立学堂,必归教育司巡察;而其教师教法,不得减少于公立程度。”这里主要是针对初等、中等学校而言,实际上也可包括私立大学。对于政府所办高等教育,林文庆提出设想:“各专门学,如各种工艺、法政、医学,各省必有一大学。如一时不能举,

则二三省共成其一可也。”^[16]

4. 传统高等教育机构的变革

清末民初,正值教育与文化转型的剧烈动荡时期,如何变革传统高等教育机构,乃是不可避免的教育问题,也反映出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文化取向。林文庆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出发,敏锐地察觉到,可改造、利用中国原有的文化教育资源,为培育新式专门人才服务。他提出:“旧日之翰林院,必重修之,以收各美学之士。拟其程式二:一为大学堂学生以考试而入;一为凡有高才硕学著书立说者入之。此为名誉翰林,无论汉学、西学,皆收之。既收,则必至中国演说十日,将稿刊布。其西文者,则译以汉文。此翰林不同于昔日之为官阶,而为大学进步之机关也。”^[17]实际上,经过变革的翰林院,是要发挥欧美诸国研究生院的功能,成为研究高深专门知识的最高学术机构。

此外,林文庆主张成立儒学会,改造国子监及各地方孔庙,使之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儒学会的功能在于:“联结同志同学之士,以传夫子之学,而劝励国人”;掌理京师国子监及各府州县孔庙。“圣庙之旁,立德学、理学、师范等学堂”。国子监改为“汉文学大机关,以广集天下文学而联络之。其宗旨为穷经、考古、习礼、治史及政治、树艺、理学、格致,以备采用”。^[18]这些见解体现了林文庆分科治学的大学教育理念,实属难能可贵。

总之,这一时期,林文庆对大学观念、大学教育的宗旨与功能以及中国大学体制变革问题,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从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联中,阐释大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从学理上分析儒学与西学的相通与互补性,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揭示中国大学教育的真意,把握中国大学变革的文化导向。这些都是林文庆大学教育思想的显著特色。

三、厦大校长任内的办学理念

1921年6月至1937年7月,林文庆受聘执长私立厦门大学达16年之久。在校主陈嘉庚的精心筹划和倾资支持下,林文庆将积累多年的办学理念付诸实践。他运用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独到的儒学观点,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反思和探索大学教育问题,艰辛育才;在曲折的办学逆境中,忍辱负重,不断总结教育经验,形成了完整的大学教育思想。

其一,秉持科学与国学并重的办学宗旨,注重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

林文庆本人学贯中西,在其拟定的《厦门大学校

旨》中强调:“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一方面研究学术,以求科学之发展,一方面阐扬文化,以促进社会之改进,使我国得与各国同等待遇之地位。^[19]这里所说的“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实与“国学”之优良传统有同等含义。1926年10月至1927年2月厦大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乃是这一办学宗旨的具体表现。

为达此办学宗旨,林文庆以《大学》首句为依据,将厦大校训改为“止于至善”,并亲自绘制校徽,沿用至今。此外,定国语为教学媒介语,崇尚科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注重国文、英文课程,加强与海外华侨联系,培育民族精神。在送呈陈嘉庚的《厦门大学民国十年度报告书》中,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制定详细规划。

其二,吸收英美大学的分科理念,创办综合性大学

私立厦大创办之初,按照德国、日本的大学模式,设置师范、商学两部。林文庆长校后,依据英美大学建制,调整各部结构。他指出:“本校原设师范学部,其目的在养成中等学校教师,以期发达本省之地方教育。文理两学部本校向无专科,仅于师范学部内附设,殊为不合。因改师范学部为教育学部,并增设文理两学部,使与商学部等同为独立之学部,以期与国内外各大学编制相当。十一年(1923年)又经评议会议决及董事会同意,增设医药、新闻诸学部。”^[20]1923年4月,厦门大学改部为科,全校设有六科,由此形成了综合大学的建制。1930年2月,厦大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改科为学院,全校设立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17个系。

其三,依据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推动重点学科、课程的建设

在经费、师资等教育资源不足的条件下,优先支持教育、国文、科学等重点学科、课程的发展。林文庆强调:“我国目下师资及教育专门人才甚为缺乏,故对于教育学科特加注意,以期养成良好师资及教育界领袖。”^[21]“国文一科,本校特别注重。凡属文言、白话、词章、考据、历史、哲学、伦理及文学之改革、语音之变迁,均莫不深为研究。盖本校之目的,在养成各种之国文学专门人材,以供教授之用,并拟用国文编撰各种教科书及参考书,使我青年子弟将来得以本国文字直接研究高深学问,不必专仰给于西国书籍。庶几吾国数千年之文化赖以不堕,而近世界各国之学术思想,亦得彼此沟通,借以阐发而无

遗。^[22]在科学研究方面,他认为:“我国科学之智识尚属幼稚,故本校之目的在设一级有精神之科学研究机关。此数年中拟以全副精神注重于科学院之建筑及设备,并拟极力罗致各种专门人才,尽毕生之力以从事于科学之教授及研究。将来厦门大学或成为我国南部之科学中心点,实意中事也。”建设最新式科学院,内分化学、物理、植物、动物、地质、诸科之实验室及各科之图书馆、博物院。“工科之设立亦极重要”。^[23]

其四,坚持开放、务实的办学原则,促进专门人才培养

林文庆主张:“本校选聘教员完全采取人才主义,毫无畛域之见,对于各学科之著名高等专门人才极为罗致,使之尽毕生之力以从事各科学之教授与研究,希望将来厦门大学成为我国南部之文化中心点。”^[24]在教学内容上,“本校之目的在养成各种高等专门人材,使本校之学生虽足不出国外而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同时并采取本国之材料以为研究之资,故本校之毕业生对于国内之风土人情必极其明了,较之留学生初次返国于国内情形茫然不知者,当大相径庭矣”。^[25]

在留学导向上,他认为:“我国学生欲留学外国者,最好先毕业于本国之大学,以其学问根底较深,外国言语较精,则其留学成绩自必事半功倍也。本校理科学生成绩优良者,将来毕业后或能得留学外国,奖学金优待,以为养成将来本校教授之材。”^[26]

其五,树立教育救国理念,倡导德智体全面发展

林文庆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事未息,经济紊乱,教育颓废,道德沦亡,“是数者专赖有高等学识充分智力之人才出,而后可以有望。此项人才,非大学毕业生莫属,故大学毕业生对于救国事业,实负有重大之责任”。^[27]救国方法很多,但大学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能够养成全国的领袖人才。救国之根本在普及教育,普及教育在学校,学校之希望在教员,教员之陶冶成材在师范大学。“中国无礼拜堂无寺院,所以全靠有相当的大学指导人格教育,养成全国的风气,使人人为士君子。”^[28]大学教育应该是德智体三方面完全的,“应该研究历史、哲学、政治、社会、风俗、习惯等,使知中国有很久的文化,我们当用何种方法使他发扬光大”。^[29]此外,“对疾病之预防、学校之卫生,均特加注意”。学生每学期入学前均须经体格检查,不合格者不许注册。“学生每日须习早操十五分钟,每星期并须习课外运动二小时,最少须选习游戏运动一种”^[30],以锻炼体魄,保证身体健康。

其六,尊重中国固有之文化,崇尚儒家价值观

林文庆认为:“学新科学不要忘却了旧文化,这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国内各大学应负责提倡,使全国之人明白。”^[31]鉴于当时“中国各大学之教授,多注重外国新学说新知识,于中国古来文化则不甚研究”,他主张:“无论大中小学,皆当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他指出,陈嘉庚先生在南洋经商发达皆由信用所致,创办集美学校及本大学,其尚义为国人所共知。“当陈校董在南洋聘予回国任校长时,予询以办学宗旨,陈校董答以当注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予是以欣然归国,予亦尊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今之学生,能以中国古代之文化为基础,则庶乎近矣。”^[32]

其七,强调文科的重要性,提倡通识教育的观念

林文庆从欧洲大学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演变历程,论述文科起源早、影响广、作用大。大学成为教育机关,乃是长期演进的结果。最初在一种合作的方式之下,大学给各国学子获得著名教师之机会,使其能研求高深的神学、哲学与文学。“教授古文与文学内包括希腊、罗马之哲学为大学教育之基本部分。其在欧美,经过不少时期,文科诸学科为学子必需之功课始被承认。”在中国,科举考试、书院,以及北京之翰林院、国子监等等,其目的均在促进本国之古文、文学、历史、哲学与政事之研究。自上述各项机关废除后,中国始设立大学以继续此等基础研究,藉得维持中国文化于进展之状态中。”^[33]

他认为,人类文化之进展决不仅由于物质之进步。“专长于科学、教育、医学、法律或特种职业学科之人,虽在其职业方面颇为有用之专家,而社会之建造者,一县一省之长官,与夫执掌国家命运之政治家,皆必为娴于文科诸学科之男女,彼等亦必皆由文科以出身。”他提出:“中国将来之复兴,全视乎毕业于文科之学子。故厦门大学重视国文、文学、哲学及文科各课程之重要,盖吾人认为国家文化之进展,全视乎此等学术之研求,因其为一切法律、经济、伦理及政治之基础。其余科学及近代学术亦皆为现代文化之不可缺者,厦门大学自当予以相当之注意。文科学生亦应有相当之科学知识,以便完全实现其所受教育之功用也。”^[34]这些论述体现了林文庆的大学通识教育思想。

四、历史地位与现实启示

林文庆的名字与厦门大学、儒学、华文教育紧密相连。他以执着的文化追求和突出的办学成就,在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为私立厦门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林文庆对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和校园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奠定了学校的办学基础和发展方向。不过,在相当长时间里,由于受历史与现实影响,林文庆的教育贡献被遗忘,其大学教育理念和儒学文化观点并未得到应有的理解与肯定,这与他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长期研究林文庆思想的新加坡学者李元瑾博士在1990年曾呼吁重评林文庆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他认为,客观公正评价林文庆,应兼顾四方面的因素:“第一,林文庆选择出任厦大校长的原因;第二,他出长大学后个人的付出与牺牲;第三,他与鲁迅之间矛盾的形成;第四,‘校主’陈嘉庚对他的评语。”^[35]

事实上,林文庆出任厦大校长,是出于对教育救国理念和儒家理想的执着追求,也是对陈嘉庚倾资兴学精神的感召与激励。他放弃新加坡优越的工作环境与地位,不计个人得失,与厦大师生共渡时艰,为兴学育人、传播儒学文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对此陈嘉庚曾予以高度评价:“牺牲一己之权利,虽年有数万元入息,舍而不顾。不宁唯是,尚有数十万之家资,委托他人,不思再经营,希冀百万或数百万,故谓自救于不顾。至谓大规模之救人,为办理大学之医科,及创设病院,可以研究发明新病症之医法,及教授养成千百学生为医师,且可再传后辈千万人。”^[36]

至于兴办国学研究院过程中的林文庆、鲁迅之争,我们也应全面分析,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上华侨移民海外,多努力保存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归国之后,则倍加珍惜本民族文化之根,林文庆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其校长任内,“厦大私立时期处处标榜儒家思想和中国固有文化,并以之跟当时新思潮互相抗衡”^[37]。有人说:“鲁迅代表的是打倒孔家店的五四精神,而林文庆则代表海外侨生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的心愿。”^[38]我们肯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精神的重大贡献与积极影响,同样也不应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海外华人向往、呵护民族传统文化之情怀。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海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推动下,林文庆在厦大校史上的地位重获肯定。2005年厦门大学建立“文庆亭”,纪念其兴学业绩与文化精神。为秉承先贤夙愿,2006年厦大复办国学研究院,进一步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林文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近代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构建了自己的大学教育模式,为当今大学教育发

展留下了诸多有益启示。

首先,办好大学需要教育家的献身精神

林文庆既是一位办学业绩突出的校长,更是一名德业双馨的教育家。厦大校长只是其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片段,而教育才是他终生追求的理想与事业。正因为如此,林文庆兢兢业业办学,实实在在为人,显示出高尚的儒者风范。在就任厦大校长前和卸任校长后,始终热心投入南洋华人和中国的教育事业。其临终遗嘱,将其当年鼓浪屿房产捐赠厦大,用于公益事业。校长是行政头衔,是官员,通过一定的行政程序获得,而教育家是不能“任命”的,也不是自封的,它是通过教育者、办学者的教育理念与办学业绩而获得的社会荣誉。林文庆赢得教育家的称誉,与其对儒家教育思想、近代西方大学理念的独见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其杰出教育贡献的名至实归。

这种教育家的奉献精神难能可贵,是当今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2008年11月,国内媒体的一项在线调查发现:70.5%的公众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教育家;蔡元培以87.98%的得票率,高居“最受推崇校长”名单榜首。也许网民对历史上的林文庆校长并不熟悉,但其教育家的业绩与情怀仍有现实意义。笔者曾表示:“当前我国也可以出现教育家型校长,关键是在体制上促使其出现。跟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学校长既面临着诸多矛盾和严峻挑战,同时也拥有改革与发展的机遇。只有出现了教育家型的校长,中国的高等教育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39]

其次,传统思想文化的教育价值不容忽视

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直处于守势、劣势,需要不断地自我辨析、改造与转换才能在新式教育中赢得栖身之地。这种深层的民族危机激起无数仁人志士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那些有成就的近代中国大学校长,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者、改革者与守护者。北大校长蔡元培,南洋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复旦校长李登辉及厦大校长林文庆,即为典型。这些校长大多通过留学等方式学习近代西洋文化,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明,但是,他们服膺中华文化,尊重和变革中国文化传统,善于利用本民族优秀文化资源,为培养专门人才服务,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今天,学术界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认识渐趋理性。但在教育实践中,忽视、漠视乃至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仍然存在,中国文化的守势状态并未得到扭转,传统文化教育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层次有待提升。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进程中,我们应加强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理念的研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教育经验。

再次,大学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具有继承性

大学是传授、探究高深学问的机构,是学者的集合体和专门人才成长的园地,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是大学的核心内容。建设高水平大学,需要进行艰苦的学术积累,精心呵护自己的学术传统。

从林文庆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办学成就中不难发现,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具有突出地位。私立厦大的办学历程,是中国近代大学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与文化嬗变的一个历史缩影。在陈嘉庚先生的全力支持下,通过林文庆校长等一批学者的共同努力,私立厦大取得了突出的办学成就。这一时期重点建设的一些学科,如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商学、法学、生物学、化学等,后来成为厦大的强势学科,跻身国内学术研究前沿。这一时期厦大形成了研究型大学的优良学术传统,促进了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建设。以教育学科为例,私立时期的厦大,培养了大批教育专门人才,为福建及其他省份的基础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此后厦大教育学科建设的学术基础,成为当今厦大教育学科的历史渊源。^[40]

最后,大学办学理念应超越功利性的束缚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基本载体,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当年林文庆不遗余力提倡华语华文教育,就是要借助民族语言文字教育,让中华文化在海内外传承与发展。当今海外华文教育热兴起,孔子学院的影响与日俱增。这既是华文价值提升之重要表现,也印证了林文庆教育思想的超前性与价值。

在市场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下,近些年来,中国大学的功利化色彩日益显明,中文等传统文化学科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国内大学生、研究生的中文水平每况愈下,这种现象令人忧虑。大学办学理念能否超越功利性的束缚,兼顾民族文化遗产,是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林文庆作为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群体的一员,其大学教育思想既有时代共性,也留下了鲜明的个性。从新马著名医生、殖民地政府的立法议员、商人、华人社会与教育的改革家,到中国大学校长、教育家,林文庆兼具多重身份,而将这些身份连接起来的是他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对儒学文化的认同与回归。

在精通英语、通晓马来语、泰米尔语、日语、法语、德语和希腊语的同时,他还如饥似渴地学会了中文普通话,还把艰深的《离骚》译成英文,让陌生的英语世界认识和理解悠久而多彩的中华文化。这是林文庆教育思想留下的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 [1] 陈嘉庚. 辟诬[N]. 南洋商报, 1924-06-16.
- [2][4][7][37] 李元瑾. 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M].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2001. 250-264.
- [3][5][6][9] 林文庆. 孔教大纲[M]. 上海:中华书局, 1914. 40, “自序”, “苏易” 弁言.
- [8][35] 李元瑾. 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M]. 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1990. 109-119, 209-213.
- [10][11][12][13][14][15][16][17][18] 林文庆. 孔教大纲[M]. 上海:中华书局, 1914. 127-129, 108-110, 93-94, 129-132.
- [19][21] 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 厦大校史资料(第一辑)[C].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40-41.
- [20][22][23][25][26][30] 林文庆. 厦门大学民国十年度报告书[R]. 1922-04-11.
- [24] 洪永宏. 林文庆的办学主张[A]. 中国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厦门文史资料(第十九辑)[C]. 1992. 18-23.
- [27] 林文庆. 大学毕业生之责任[N]. 厦大周刊, (155), 1926-06-19.
- [28][29][31] 本校五周年纪念会林校长之演说辞[N]. 厦大周刊, 1926, (145).
- [32] 校庆三周年纪念会林校长之演说辞[J]. 民国日报, 1924-04-14.
- [33][34] 林文庆. 文科之重要[J]. 厦门大学文科半月刊, 1928, (1).
- [36] 陈嘉庚先生在中华俱乐部欢迎林文庆先生之演说词[N]. 南洋商报, 1926-02-01.
- [38] 韩山元. 半个林文庆[N]. 联合早报, 2007-02-02.
- [39] 李颖, 黄冲. 70.5%的人希望大学校长首先是教育家[N]. 中国青年报, 2008-11-18.
- [40] 张亚群. 私立时期厦门大学教育学科的地位与影响[A]. 贺国庆. 教育史研究:观念、视野与方法——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9. 285-291.

(本文责任编辑 宋 雯)